

现代中国

第十二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

第十二辑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ISBN 978-7-301-12933-3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301-12933-3.

9 787301 129333 >

定价：38.00元

欽
火
中
國

第十二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第十二辑/陈平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301-12933-3

I. 现…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221 号

书 名：现代中国·第十二辑

著作责任者：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艾 英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2933-3/G · 221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刷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商：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372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现代中国

第十二辑

目 录

论 文

作为运动的新文化	袁一丹(1)
“文学革命”的另一面	
——民初政治言论视野中的“文学”	卫 纯(18)
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问题	
——以胡适、鲁迅与周作人を中心	张春田(37)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研究	
——中英文著述的互动与展开	吴德祖(60)
19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五四的叙述	萨支山(80)
现代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	
——作为激进诠释学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张旭东(93)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中国新诗总系·30年代卷》导言(上)	孙玉石(119)
新诗理论中的“形象之争”：美学、政治、形而上学	张松建(142)
“言志”的苦心与文心	
——周作人“苦住”期间创作之分析	高恒文(170)
“长不大”的三毛：从早期的都市顽童到1949年前后的流浪儿	徐兰君(188)
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理路(上)	胡 军(205)
演讲与评论	
重建“文学史”	陈平原(222)

书 评

文学、思想与政治的纠葛

- 读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 李雅娟(230)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政治主体性的重建

- 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张慧瑜(238)
在对鲁迅的承担之中

- 读《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 刘子凌(244)
在中国追索“现代”

- 评《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 李佳(248)
“现代性”视野的拓展

- 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 李松睿(253)

作为“左翼”的鲁迅及其可能性

- 《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读后 张广海(259)

“国民作家”与“国家”视野

- 评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李国华(264)

作为话语的“晚清古文”

- 评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 陆胤(270)

幻象背后的真实

- 评《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 费冬梅(279)

报刊研究介入理论热点探讨的可能性

- 评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 李斌(284)

“马赛克”型都市图景的重演

- 评《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 燕子(289)

记忆与呈现报刊的另一种方式

- 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林峰(295)

- 编后 (299)

现代中国·第十二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作为运动的新文化

袁一丹

一 新文化如何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对于1920年代前期实际从事文化运动的各方面的势力来说，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不过，后来者更信用其追封的领袖人物的说法，所以引述最多的是陈独秀1920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演讲，题目就叫《新文化运动是什么》^①。他先划定文化的疆界，包括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等领域，将军事、产业以及实际政治排除在外，然后径直进入各个领域的内部进行辨析。^②陈独秀的这次演讲，其实只勉强回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忽略了何谓“新……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运动，然后才去判别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以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大多围绕中心的人物、社团、报刊展开，缺乏使运动成其为运动的观念。从浑朴的过程的观念出发，就会追问：新文化作为运动的同一性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新文化如何从局部的、地方性的运动中获取动力？

周策纵梳理五四运动史时曾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开始出现，到1920年初变得十分流行。^③但他举的原始出处并不准确，粗略地

-
- ① 通过陈独秀此文来理解何谓“新文化运动”的例子，参见舒新城《我和教育》（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中五四运动一节。
 - ②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原载于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1日，收入《新青年》第7卷第5号。
 -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七“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他所举的“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出处是《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上记者答读者问。

翻检一下这时期的报刊，不难发现在所谓新文化的核心刊物《新青年》、《新潮》吸纳这个名词之前，“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运动”已经被趋新的舆论界广泛使用。当时对文化运动最集中的报道见于“研究系”在北京的言论机关《晨报》^①。1919年下半年晨报馆数次添聘本京访员及各地的通讯记者，酬金从优而且门槛很低，只要寄稿连登两次即为合格。^② 于是从十月份起该报登载了大批的地方特约通讯，其中所谓的文化运动又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还出现了以某地之“新思潮”、某地之“文化运动观”、某地之“新文化运动”为题的专门报道。“文化运动”或说“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最初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被无意识地频繁使用，并为一般社会所熟悉、接受的。

对新文化运动既有的理解，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或者1917年《新青年》的北上作为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标志。然而从五四前思想界的状况看，任何方面的势力都不可能正式打出“文化运动”的旗号。此前惯用的名目是“革命”或“改良”，而不是“运动”，是“政治”、“思想”、“文学”、“道德”，而不是无所不包的“文化”。五四以后，“运动”才成为舆论界流行的词汇，且不论“社会运动”、“群众运动”以及不大成立的“个人运动”，连声名显赫的“文学革命”也仿效“新文化运动”的提法，易名为“新文学运动”。“运动”一词的崛起无疑凭借的是五四的影响，因为五四充分显示了运动背后蕴藏的社会能量。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政治、文化互为因果的关系，更在于前后相承的运动模式。

“新文化运动”在凝固成一个历史概念之前，曾作为相当活跃的名词存在过。《晨报》招募的这些未经培训的通讯记者，他们对文化运动的理解是褊狭的。文化运动在他们那里，基本上可以用出版与结社来代替。从《晨报》上大致雷同的特约通讯可以推知，各地的文化运动几乎遵循同一模式，其间创办的各类出版物都不难找出原型：以评论为名的，如毛泽东主撰的《湘江评论》、张静庐筹办的《七天评论》、浙江一师的《钱江评论》，明显取法的是《每周评论》；专注教育的杂志，如浙江省教育会改良后的《教育潮》、舒新城在长沙兴办的《湖南教育月刊》，则仿效蒋梦麟主编、标举杜威主义的《新教育》；相对通俗、面向平民的刊物，如天津真社的《新生命》及其遭禁复刊的《新生》模仿的是北大出版的《新生活》。这些衍生出来的刊物，都打着绍介新文化的旗帜，其作为文化运动的据点更显豁的标志是，不同程度

^① 《晨报》1919年底至1920年初关于文化运动的地方特约通讯：章公《天津报界将放异彩》（1919年10月25日）、韶卿《新潮中底“周刊世界”》（1919年11月25日）、H.C.《湖南之文化运动观》（1919年12月3日）、筱青《五四前后之陕西学生》（1919年11月30日）、南公《云南之文化运动》（1920年1月11日）、小轩《鄂学生之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13日）等。

^② 《晨报》1919年12月5日“本报再聘本京、各地访员”。

上采用了白话文体。就出版物背靠的社会组织而言，最普遍的是各地的学生联合会，此外，多为中等以上的学校，包括师范、专门学校及教会学校，还有学校内簇生的小社团。文化运动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五四运动横向扩张的进程，仍是从学界辐射到一般社会。

文化运动向四周扩张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做太多架桥铺路的工作，出版界现成的发行路线，已经为新文化的传播作了相当的铺垫。除却各地自办自销的出版物，京沪作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借助中华、群益等书局的销售网络，对外输送知名的新式报刊，如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带有“研究系”背景的《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后易名为《改造》），国民党方面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与《建设》，还有以学社为依托的《少年中国》及各色势力杂凑起来的《新中国》等。据《时事新报》记者统计：仅在长沙一地，新式刊物已销出千余份，其中《新青年》这样的金字招牌最具号召力，售量多达三百份，《新中国》分销处多、《新生活》价值低廉，均销至二百份，《解放与改造》、《建设》之类有党派色彩的杂志销数也有百份上下，其余各得部分人的信仰，可销至数十份或十余份。^①

出版物的风行是看得见的文化“运动”，更切实的运动着力在人上。被席卷入运动中的个人以出版物为媒介形成了一个广泛而狭窄的阅读联盟。这里的广泛指地域而言，就阶层来说，新文化的追捧者主要还是有相当的读写能力和知识储备的（准）学生，他们在阅读的同时，也在学习一种新鲜的表达技巧，由此融入到这个看不见的对话群体中。而报刊提供的交流渠道，如《新青年》的通信栏、《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给这些狂热的读者暗中允诺了一个身份转换的机遇：从匿名的消费者跃升为新文化的参与者乃至代言人。

被《时事新报》的主笔张东荪“运动”到新文化的阵营中来的舒新城在回忆录中称，自民国五年起“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刊物接踵而起，自己“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得到，无不详加阅读。竟至吃饭入厕都在看书阅报，以至成了胃病”。当时长沙尚无代售新派刊物兼报纸的书店，楚怡学校的体育教员黄醒，个人创办一种《体育周报》，以之与各种刊物交换，且代售各种刊物，并亲自送达。舒新城与黄醒本就相熟，托他代购了所有的刊物，同时于本省的报纸而外，又订阅了《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三种报纸连同五六十种定期刊物，一年共九十余元。舒新

^① 《湖南新思潮之发展·新杂志之功》，《时事新报》1919年10月25日。

城只有四十五元一月的薪修，还要供养家庭，只能通过笔耕，一面替《体育周报》撰文，一面向上海、北京各处投稿，来换取他的“精神食粮”^①。1919年末，他因在“学灯”上发表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而丢掉教职，便与岳麓的旧同学合办了《湖南教育月刊》，又引起当地军阀的注意，不得不离开长沙。由于在上海投稿较多，且与《时事新报》的张东荪常有通讯，舒新城打算投奔到研究系麾下。手脚灵活的张东荪五四后也有意从所谓新进作家中延揽一批干将，背景干净、新知丰富的舒新城自是最佳人选。舒氏的第一部教育书稿，即由梁启超发起的尚志学会收购，尚志学会可以说是《时事新报》与《晨报》的延扩^②。至于二十年代初舒、张二人携手主持中国公学、应对风潮，为研究系在教育界占势力，已是后话。

所谓新旧思潮的冲突不仅是派系间的较量，新文化的推进逼迫运动中的个人做出选择，“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最激烈的冲突也是最深入的运动发生在各人心中的“狭巷”。出版物的狂潮不仅为新教育吸纳了舒新城这样的人才，也为本是曲高和寡的新文学培养了无数的文学青年。这些无名的文学青年从勃兴的新文化中预见到“一个转机”，出版物教导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变为铅字，从而与另一些光辉熠熠、似乎高不可攀的名字出现在同一版面上。三十年代才崭露头角的作家沈从文就是新文化从旧势力处争取过来的文学青年。《从文自传》的最后一节，讲的就是他向新文化投诚的经过。在1920年代初地方自治的风气中，沈从文所在的部队也筹办起文化事业，他被借调到新设的报馆担任校对工作，与负责排印的印刷工头住在一起。来自长沙的印刷工人，受五四的影响，得风气之先接触到好些新派书报，而小兵沈从文此时还沉湎在线装的字帖同诗集里。这个有点“朽”的乡巴佬从大城市来的进步工人那里学到了他关于新文化的第一课。在印刷工人的点拨下，沈从文知道了“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名叫《改造》，《超人》的作者是一位“天下闻名的女诗人”。通过翻看这些书报，他又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发现白话与文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落脚的虚字。但更关键的启悟是，浸泡在湘西世界里的沈从文从白纸黑字的印刷品上“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沈从文被这些新式的书报彻底征服了，他毅然决然地投降于新文化，“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日后当他看到报上有捐款兴学的新闻，便也将十天的薪饷寄给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的编辑处，末尾署名“隐名兵士”。在这些出版物的感召下，沈从文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

^① 舒新城《我和教育》，第六章“教务主任”第四节五四运动，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46—147页。

^② 舒新城《我和教育》，第七章“师范教员”第一节“‘五四’后的中国教育界”，第149页。

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于是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求学卖文的生涯。^① 1920年代中期，沈从文的文章终于出现在造就了“天下闻名的女诗人”冰心的《晨报副刊》上。但他这时期的作品还称不上严格意义的小说，只能算是入门的习作，经由模拟新文坛上流行的各式文体，抒发他对于一种触而不及的身份的向往。就像小学生描红一样，沈从文一笔一画地揣摩着“文学”的规则，迫不及待地要加入到新文化的体制中。直到1930年代，从习作者晋升为小说家的沈从文才找到属于自己的经验与文体，知道调动新文化以外的资源，来对抗（也可以说是调剂）新文化人的口味。

沈从文弃武从文的经过，说明新文化的运动机制首要不是独创而是有意的模仿，先求同而后立异，立异也是为求得进一步的认同。前述出版物的复制、散播也可以辅证文化运动的模仿原则。梁启超在定义“什么是文化”时，借用佛教术语，称文化不是一家一派的“别业”，而是群体的“共业”，所以，固然离不开一二人的首创，但更需要后进者的模仿，有意识的模仿就等同于复数的创造。^② 由先进跌为后进的《东方杂志》也发文论证模仿原则在新旧文化的转移期所起的作用。作者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特尔德(Gabriel Tarde)的理论，指出模仿不单是守旧派的家法，趋新者一样要长于此技，后者的摹本不是前人的典范，而是时下流行的观念与表达方式。守旧与趋新不过是模仿原则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现今之时代所以是趋新的时代，或者说流行模仿的时代，因为新旧势力的强弱对比在名义上(不一定在实力上)已经扭转过来，社会的一般心理也就顺势从念旧转为尊新。^③

二 文化运动与地方新政：以《新中国》为例

能别具只眼从正面来论证模仿之天经地义者，毕竟是极少数，对于运动中泛滥的复制品，大部分新文化的拥戴者是不能容忍的。1919年底《时事新报·学灯》的一位读者就对文化运动的现状生出了疑问，他以为半年来激增的书报中，诚然有货真价实的，但也有“似是实非”、“不新不旧”、“半身不遂”的，还有“打假招牌”的，正宗的文化运动家对后几种出版物应当鸣鼓而攻之。^④ 面对蜂拥而起的“新文化”的分店，《新青年》这家老字号也忧乐参半，陈独秀感叹民族性中缺少创造力，“有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

②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年11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讲演，《晨报副刊》1922年12月1日。

③ 三无：《新旧势力之强弱与文化转移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7卷17号。

④ 通讯（梦熊致宗白华），《时事新报》1919年12月11日。

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①。其实“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打假运动，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邀约《时事新报》的主笔张东荪共同致力于文化运动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写到此地，忽而想到我们的文化运动有种危险：就是许多投机的人，也办了些假冒招牌的杂志，——《新中国》其尤著者——夹在里面胡闹，弄得鱼龙混杂，也发生许多障碍。如刘少少办国子监式大学的主张，人家不知道的误以为新思潮；李涵秋“吃屎”的小说，人家误信为新文艺，岂不是大笑话吗？我想贵报应当辟一个“蒲鞭”，将他们鞭策一回才是。得罪人有什么要紧！^②

罗家伦建议《时事新报》设“蒲鞭”以示仁政，绝没想到开罪的人可能是胡适。他点名批评的冒牌杂志《新中国》，背后的主持者却是“新文化运动”追认的领袖。《新中国》创刊于1919年5月，筹办当在五四以前。3月份作为南京高师代表约请杜威来华的陶知行复信胡适称：“《新中国》杂志发现很是件好事，看来信的笔气似乎是由老兄主持的，若是果然如此，那我就勉力去做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副厚意。”^③4月初胡适留美时期的密友杨铨也听闻他正代人筹办《新中国》，去信询问进行如何。^④最确凿的证据莫过于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四月下旬给胡适的一封信：

乍阅《新申报》，知《新中国》杂志将要出版，甚以为喜。敝馆愿任上海总经理之事，不识可否？条件如何，请速函达。如以为可，请将敝馆刊入末页，以便买客周知为荷。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⑤

胡适在《新中国》上发表的文章不多，头几期以绍介杜威学说为主，创刊号上的一篇是翻译小说，位置并不醒目，放在新文艺的部分。^⑥他的作用可能是在幕后联络大学方面的人物，如执教北大的高一涵、刘文典、宋春舫，学生辈的张厚载、朱谦之等。

^① 陈独秀：《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② 通讯（罗家伦致张东荪），写于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

^③ 陶行知致胡适（1919年3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9页。

^④ 杨杏佛致胡适（1919年4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页。

^⑤ 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0页。

^⑥ 胡适在《新中国》早期发表的文章《一件美术品》（第1卷第1号）、《杜威论思想》（第1卷第2号）、《杜威演讲录》（第1卷第3号）。

为罗家伦所不屑的刘少少，当时也在北大任职，主讲老庄哲学，与教授哲学史的胡适应该有所往还。此人在民初的舆论界是与黄远庸齐名的记者，也是鼓吹立宪的政论家，“少少”一名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所谓“办国子监式大学的主张”指他发表在《新中国》一卷二、三号上的《中国大学论》。刘少少与《新青年》一派素有过节，就在罗家伦讥刺《中国大学论》的前一个月，鲁迅曾化名“黄棘”为《国民公报》孙伏园主编的“寸铁”栏撰写了一则小杂感，称这位大学讲师为女伶“刘喜奎的臣子”，并反击刘少少称“白话是马太福音体”的谬论^①。至于罗家伦信中提及的小说家李涵秋，凭借一部《广陵潮》文名大噪，报界甚至有“无李不开张”的说法，足见他在报纸副张中的地位。《新中国》的“新文艺”，独立于旧诗词的艺文栏，主要由新剧和小说构成，前者靠宋春舫的译作支撑，后者多为白话短篇，作者除李涵秋外，还有包天笑、周瘦鹃等鸳鸯派的一流写手，以及与张厚载联手挑战《新青年》旧戏改良的剧评家兼小说家冯叔鸾。这样的写作阵营，与罗家伦理想的“新文艺”或“新思潮”确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新中国》一出，便借五四之势与《新青年》、《新潮》等一道成为销路最广，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杂志。但在随后对新出版物的大批判中，它又沦为众矢之的，不仅被认作冒牌杂志，还被看成是军阀、官僚的言论机关。面对外间的声讨，《新中国》的编者在1920年正月改出二卷一号时，刊出特别启事，称其抱定不党不私主义，不必宣告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也不愿盲目堕入“新”的漩涡，尽力在营业上立住脚跟。批评者则称《新中国》搜罗的文章，新旧杂糅，包罗万象，不愧为“杂”志，每一期必定要请出几位“大人先生”来捧场，或是照片或是题字，还收买了许多“金钱主义的文化运动家”与别种杂志斗宝，妄图用督军、省长、议员的头衔，博士、大学教员、报馆主笔的招牌，来提高自家的身价。^②

《新中国》最招人非议的是一卷七期关于山西的特别报道。该期出版不久，《晨报》第七张的“编辑余谭”即谓之为“阎锡山号”^③。《时事新报》紧随其后，张东荪在时评中呼应了《晨报》编辑的看法，称他过去对《新中国》的印象不过是“北京几个红官僚，胡乱拉些文人学士办的”杂志，谈不上有什么主义，但这一期倒有精彩之处：“书面三个血红的大字，是阎锡山的手笔。翻过来一张清鲜耀目的图画，是阎锡山的玉照。再翻过来是阎锡山的传略。底下便是阎锡山的训话啊，阎锡山的言论啊，山西的用民政治啊，山西的教育计画啊，山西的告示啊，活像是一册狠丰

① 《国民公报》1919年8月12日，“寸铁”栏。参见孙玉石、方锡德《锋锐的〈寸铁〉光辉永在——读新发现的鲁迅四篇佚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② 朱朴：《六种杂志的批评》，《新人》第1卷第5号（“文化运动批评号”中）。

③ 《晨报》1919年11月24日“编辑余谭”。

富的山西阎锡山号。”①《时事新报》及《晨报》的批评都集中在阎锡山对于“主义”的拒斥。阎氏为山西学生训话时，称“无论说甚么主义，皆人类精神病之微菌虫”，“皆调戏青年学生精神之媒介物”。其对属官讲演，又说“为政者值此万种主义发生时代，新者当打破万种主义”。张东荪以为，阎氏“非主义”的论调，正合于《新中国》杂志的主义。由《新中国》“非主义”的主义，张氏联想到胡适的“少谭些主义”，但他立马分辨道，这两者的意思是不同的，至少胡适并没将主义认作是“微菌虫”，是“调戏青年学生精神之媒介物”。张东荪的回护之词有些牵强，他的联想未尝没有道理，《新中国》、阎锡山、胡适对于“主义”的态度不尽一致，三者之间确实又有某种利益关系。

《晨报》编辑不解《新中国》为何肯用四十六页的篇幅替山西新政打广告，从胡适当年的行踪可知，这是还阎锡山的一个人情。“阎锡山号”出刊于1919年11月，10月上旬胡适陪同杜威考察山西教育，8日给高一涵等人的信中，称其一行到太原后，当地官署招呼极为周到，“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很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杜威去时，颈上带着软领！——可谓哲学家本色”。胡适从街上学生穿的蓝布衣服看出山西“气象很好”，只是对路灯柱上阎氏“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稍感不满。②隔日，他在国立山西大学为杜威作翻译，并演说《娘子关外的新潮流》，提议该校学生直升或转学北大。胡适两年后仍不忘向阎督军进言，在日记中称山西第一要事在于人才，山西大学便是改良的第一步；对于山西的新政，不该下“积极的谩骂”，而应给予“建设的指点”。③

《新中国》大肆宣扬阎锡山的新政，透露出文化运动与地方自治甚至军阀政治的暧昧关系。这从行伍出身的沈从文在湘西的革新运动中——湘西的自治计划，按《从文自传》的说法，正是参考山西新政拟定的——受到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也可得到印证。④1919年10月上海《中华新报》一篇题为《文化运动》的社论称：

前从事政治者，现颇有人注意社会事业，如提倡经济及文化等，殊不乏人。
近闻广州方面，有创办西南大学之议，并于上海组织一规模宏大之编译局。黎黄陂亦有拟办武汉大学说，均在进行中，是不可谓非文化运动也。

《时事新报》上“文化运动”这个词也常与地方军阀的业绩连在一起。如在报道“南京之文化运动”时，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设置分会，会员黄忏华应聘入滇之事，便与云南唐继尧的文化举措有关。⑤更为人所知的是1920年底，驱逐了桂系

① 张东荪：《〈新中国〉的“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7日。

② 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72—73页。

③ 1921年5月11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④ 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

⑤ 《南京之文化运动》，《时事新报》1919年11月5日。

军阀，刚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邀约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南下主持教育。^①他率军驻扎闽南期间，就曾在漳州先后创办过《闽星半周刊》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②。陈炯明的文化运动，从属于他“联省自治”的规划，因各方牵制而胎死腹中，却间接导致了《新青年》阵营的解体。

1920年初胡适在《中华日报》上公开声称“新思潮运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非政治”的革新运动，目的是思想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他认定现今的政局是没有解决的捷径的，所以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进行。“新文化运动”对军阀、政客的宣言是：“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③而胡适暗中主持的《新中国》，正说明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与地方势力携手走向了泛政治化的道路。

三 新文化的权力结构：从《新人》的视角

1919年11月张东荪又收到罗家伦的来信，说上海是一个大“假古董场”，一般鸳鸯蝴蝶派的斗方名士也讲起新思潮来。张氏以《新中国》作例子反问：“北京是个什么场？是个新脑筋滋养料的生产场吗？”^④罗家伦对上海舆论环境的批评，不是他个人的偏见，新潮社员俞平伯出洋途经上海，即称此地“新运动”的障碍就是没有障碍。^⑤1920年暂居沪上的陈独秀，也认为上海这样“龌龊”的社会，根本不配做舆论和文化的中心^⑥，什么“觉悟”、“爱国”、“解放”、“改造”、“新思潮”、“新文化”等流行的名词，一到这里便成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他尤其不满红男绿女的小说家及黑幕文人挂起新思潮的招牌骗钱。^⑦

陈独秀诸人对上海文化运动的指摘并非空穴来风，1919年9月初《时事新报》以来函照登的形式刊载了一则学社简章，自称“为革新思想，促进学术，集合同志，互相切磋，定名曰新思潮学社”，宗旨是“谋社会改革，作文化运动”^⑧。年底该学社又预备发行名为《新思潮》的杂志，其撰述者除了“国内有名人物”，当然少不了“旅欧旅美的几位同志”，而社长闻野鹤却是罗家伦所谓的鸳鸯蝴蝶派的斗方名

^① 参阅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闽星半周刊》（1919年12月—1920年3月），陈秋霖、谢婴白主编，漳州新闻学书局发行。陈炯明在《闽星》上发表的文章有《不为罪恶的奴隶》、《生活与生趣》等。

^③ 胡适《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

^④ 张东荪《〈新中国〉的“主义”》。

^⑤ 俞平伯《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

^⑥ 陈独秀《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⑦ 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⑧ 《新思潮学社简章》（来函），《时事新报》1919年9月4日。

士。据郑逸梅描述，此君“头巨而体侏儒，喜洋装革履以趋时尚，不知者以为拾西人牙慧者流，实则其胸中幽情绵邈，老气横秋，读之者又以为出于名宿之手”^①。闻野鹤原是南社成员，因在《民国日报》上盛赞同光体，与柳亚子发生争执而退出南社。^② 1920年代初，他既与人合编过“礼拜六”派的杂志^③，也在上海新文化书社以“新文学丛书”的名义出版过《白话诗入门》，甚至还参与了前期创造社。1930年代后，由洋场才子晋升为大学教授，以闻有一名行世，转治语言文字之学，斐然成家。这位《新思潮》社长的传奇经历或许是特例，但至少说明上海文化运动之品流混杂。

对于罗家伦两次来信中打假的呼吁，张东荪的回应并不积极，反倒认为文化运动的障碍不是四周的模仿而是中心的专制。他向罗家伦转达了上海这边的传闻，说“现在有专卖新思潮的真正老店，挂起‘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和‘认明招牌严防假冒’的招牌”，提醒北大方面设法消除这种误会。^④ 当新潮社出来澄清误会时，却引发了一场“京海之争”：

本社出版品，只有“新潮杂志”及“新潮丛书”两部分……出版已届半年，早为国人所共睹。乃六月底上海泰东图书局始另有所谓新潮丛书之广告发现，与本社“新潮丛书”名目虽则混淆，其实并非一事。再另有命名“上海新潮社”者，与本社毫无关系；其出版品当然与本社无涉。因滋误会，特此声明。^⑤

北大新潮社在《申报》上发表的特别声明，招致上海新潮社针锋相对地还击：

本社系上海同志所组织，初名“上海新思潮学社”，后因另有《新思潮》杂志出现，乃改为“上海新潮社”，与北京大学新潮社不同。……北大新潮丛书系四月出现，本社丛书告白布露于三月十日，盖当时尚不知北大新潮社亦将有丛书出版，并不知“新潮”二字，已为北大同学之专利品也。及出书后恐相混淆，因于“新潮丛书”下注文学系哲学系字样，以别不分统系之北大新潮丛书。事后终嫌同名，又与“新人社”商议，嗣后二社丛书部合并，一律改名“新人丛书”。每出一书，由两社合组审查之，以免滋误。但今北大新潮社既有包办“新潮”二字之口吻，本社殊不能受其胁迫，业向“新人社”取消前议，嗣后所出丛书，仍名“新潮丛书”，以示不许任何人包办“新潮”二字。与夫占名在先，无

-
- ① 郑逸梅：《小品大观》，上海校经山房，1935年8月。转引自《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564页。
 - ② 参见柳亚子《我和朱鸳鸯的公案》，原载《越风》半月刊第7期，1936年2月，收入《南社纪略》，上海：开华书局，1940年。
 - ③ 闻野鹤、赵赤羽主编《礼拜花》周刊，上海礼拜花小说周刊社，1期即停刊，1921年，未见。
 - ④ 通讯（张东荪致罗家伦），《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4日。
 - ⑤ 《申报》1920年7月30日。

避贤避贵之必要矣。^①

在闻野鹤执掌的新思潮学社与北大新潮社之间，依傍泰东的这批同志宁避嫌而不避贤，自命为“上海新潮社”。这一命名不能排除书局有意混淆视听、从中渔利的动机，但上海新潮社的自我辩解，重点不在于占名的先后，而是不许任何人包办文化运动，防止“新潮”二字成为北大的专利。

泰东书局原有政学系的背景，自讨袁得胜后，股东纷纷入京做官，店铺交由赵南公经理，靠《新华春梦记》一类的小说赚钱。^②五四后眼见新出版物热销，赵南公打算在旧小说积攒起来的账底外另行打桩，于是拉拢张静庐、王无为等人，组成了上海新潮社与新人社。^③其实无论新潮社还是新人社，都是这两三人在维持，与泰东声势壮大后扶植的创造社不可同日而语。张静庐主编的《新的小说》挂在新潮社名下，《新人》杂志一开始只有王无为在那里唱独角戏。就涉足文化运动的深浅而论，上海新潮社虽与北大方面有命名之争，它的专攻还是小说，对新文化的权威发起挑战的是以批评为主的《新人》杂志。

新人社草创于1920年初，发行刊物是为了募集同志，改造旧人，用和平的手段，“去占领我们所要求的空间，建设我们所要求的社会”^④。新人社拟定的革命方针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变更实现人的改造。旧的社会组织，在“新人”看来，是纵向的，是累进叠上、少数吸引多数、强大支配弱小的组织；他们向往的新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横向组织起来的。^⑤“新人”对空间的要求，对社会结构的不满，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有关。

《新人》杂志最初的编辑方式是无所不谈，从第二期起改为专题研究，1920年下半年连续推出上中下三册的“文化运动批评号”。同人在引言中承认，这三册的文字无不加重了感情的分量，并且都用于批评过失的一面，这样的态度他们自知是不太公允的，只是文化运动造出的种种丑态，使他们时或逾越了批评的界限。^⑥作为新人社的首领，王无为开篇即对文化运动的当权派下了“哀的美敦”书，他指出文化运动的障碍物不是反动的政府，而来自运动本身。政府对运动的压迫就好像拍皮球，拍得越起劲，皮球跳得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遏止反而促进了运动

① 《申报》1920年8月1日。

② 《新华春梦记》，一名《洪宪演义》，为杨尘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共一百回，七十万言，泰东广告称此书“发行以来销数逾万”。

③ 参见张静庐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十四“踏进出版界”，十五“泰东图书局的转变”，上海书店，1984年。

④ 《新人宣言书·新人约》，《新人》第1卷第1号，1920年4月3日。

⑤ 秀水：《新人的革命方针》，《新人》第1卷第1号，“新人的言论坛”。

⑥ 全人：《文化运动批评号引言》，《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